

石 上 春 秋

李茸茸



西安碑林博物馆唐代开成石经。

千年古都，邂逅碑林。指尖触及《诗经·关雎》碑刻的刹那，凉意顺着掌纹攀爬而上。那些历经千年凿刻的文字，早已被岁月磨去棱角，却在凹陷处凝成霜色的痂，结在墨色的石肤上。阳光斜斜照射进展厅，在带着裂纹的碑面上投下斑驳光影，浅浅的蜿蜒划痕恰似穿过“关关雎鸠”四字，仿佛时光亲手为诗句添上的缀笔。

两千多年前，或许也有匠人如我这般，屏息凝神地盯着碑面，将先民的智慧与情感一刀刀镌刻。墨迹会褪色，竹筒会腐朽，唯有这历经风雨的碑刻，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浪漫，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豪情，原原本本带到今天。当目光对上“兼葭苍苍，白露为霜”的那一刻，恍惚间竟闻到了渭水河畔的兼葭清香，看到了那个在水一方的身影。

沿着碑廊前行，《开成石经》仿佛一部展开的千年长卷，将十二部儒家典籍化作六十五万余字，深深镌刻于石。《孝经·开宗明义章》碑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训诫，《论语》残石上“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箴言，还有《礼记·月令》里“春分之日，玄鸟至；后五日，雷乃发声；后五日，始电”这般对节气气候细致入微的记录，历经千年雨雪风霜，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愈发清晰。当我们在石碑前驻足，实际上是在与无数个旧时代的灵魂对话，是在感受民族精神从远古走来的坚定足音。

书法碑刻更是一座艺术的宝库。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笔力雄浑，横平竖直间似有盛唐气象奔涌而出；柳公权的《玄秘塔碑》骨力遒劲，笔画转折处暗藏着文人风骨。它们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岁月的长河中，以文字为舟，镌刻为桨，穿越战火与离乱，将文明的火种传递至今。当安史之乱的硝烟弥漫长安，这些石碑几经转运，在动荡平息后重见天日，带着满身伤痕继续诉说着先辈们的故事与思想。

我忽然懂得，为何中华文明能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北宋时期，陕西路转运副使吕大忠见到历经战火的石经地处洼下，霖潦冲注，毅然主持将其迁移至孔庙，规划碑刻陈列布局，形成如今碑石“森立如林”的雏形。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甘愿“食去重肉，衣去重彩”，穷尽半生之力收藏碑拓，他们珍藏的不仅是拓片，更是对文化传承的执着信念。这些碑刻就像是无声的纽带，将文明根脉紧紧相连，让我们无论身处何方，都能找到精神的根。当我们抚摸着这些历经沧桑的石碑，感受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认同感。在指尖与石纹的触碰间，让文明的基因悄然融入血脉，与三千多年前的山风，两千多年前的月色温柔共鸣。

夕阳的余晖为西安碑林博物馆镀上一层金色，石碑上的文字在光影中忽明忽暗，仿佛在诉说着古老而又崭新的故事。我知道，这石上的春秋，将继续书写下去，永远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家园。

胜 迹

离开家乡20多年了，每次和友人聊起，我都要夸赞我的家乡“彬县”（今陕西彬州市），这是华夏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每一块土地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演绎着动人的故事。

《诗经·邠风·七月》就来自这块古老的土地，它对农事活动进行了生动细致地描写，说明当时西周农业在全国曾起到先导作用。历史把“重稼穡、殖五谷”称为邠风遗训。至今北京先农坛还保留着古建筑“诵豳堂”，颐和园内还有座“邠风桥”，可见泾河农业对我国农业影响之深远。

地处丝路驿站，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的大佛寺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寺庙之一。佛教就是经过这条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僧侣和商贸也是从这条路走向西域。大佛寺石窟，是陕西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也是中国现存初唐时期和盛唐时期规模最大、最为精美的石窟群，被誉为陕西和古丝绸之路第一大佛，不仅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最值得褒扬的是，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彬州大佛寺石窟被正式列入丝绸之路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咸阳市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空白。

走，回家乡看看！作为彬州近30万儿女中的一员，家乡的变化牵动着我的心，每次回家无不惊叹于这座昔日的贫困小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历来佛教降魔自然灾害，因此也从这里能找到答案。传说，阿弥陀佛诞生不久，泾河大水突发，庄稼、房舍毁于一旦，老百姓痛哭，纷纷拥至大佛脚下，焚香叩头，叫苦连天，以乞保佑。

洪水毁坏了人们的劳动成果，阴暗的天，荒凉的田野；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裂……阿弥陀佛施佛法，无名指轻轻点

河，眼前顿时清明，洪水向着堤岸悄然离去。

谁知佛指刚收，洪水涌上岸来，阿弥陀佛浑身一阵莫名紧张，随后又抬起他的无名指指向泾水。自此，他便跏趺于幽深空灵的石窟中，虔诚凝视，左手按膝，右手端举，掌心向外，四指直上伸，唯无名指微微前屈。从此，这里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水灾，一直平安至今……这尊20米高的阿弥陀佛，袒胸披衣，螺髻罩顶，鼻大口合，两耳垂肩，如一伟岸的长者坐于石窟中央。虽然历经千年风雨沧桑，依然巍然屹立，工匠们奇特的构思和造型，在古代历史研究和美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大佛寺石窟，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依靠石山，近临泾水，凿岩为室，雕石成像。你如果仁立于大佛寺石窟面前，放眼望去，才知彻堆的石台，名为“明镜台”，横卧台上的是一座楼阁。

传说终究是传说。据史料记载：“自公元1933—1936年期间，有记载的大洪水发生过7次，最大洪水量均在1万立方米/秒左右，形成水高数丈、铺天盖地、冲没田庐、伤害人畜等无法计算的后果。泾河在彬县（今彬州市）境内有河无堤，有城无防。每到汛期，洪水滚动切割，崩农田而毁庄稼，河流左右冲刷，危及到彬县的发展。河岸崩塌常常危及沿岸公路设施，312国道彬县段数次被淹被毁，严重威胁着沿岸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关于泾河的



大佛寺石窟博物馆。

遇的特大暴雨袭击，19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219.3毫米，最高洪峰陡然增至3280立方米/秒，这是自彬县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了气象资料记载以来，境内发生的雨势最急、雨量最大、雨情最紧的一次特大暴雨。刚建成的一期防洪大堤，在特大暴雨面前岿然不动，咆哮肆虐的泾河驯服在大堤脚下……

“城在林中、院在花中、路在树中、人在景中”无论你行走在“诗经风情园”“邠风苑”，还是步入“高原明珠”侍郎湖，或延伸向镇村的公路，到处都是迷人的风景。

如今，走在泾河新区的大堤上，泾河束水而下，“泾河新区”新开垦的空地上，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新式的生活小区相继建成，中国西部义乌商贸城落户，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商业

龙首渠与“龙骨”

吴胜利

龙首渠大约是在汉武帝年间修建的，这是我国古人开发洛河水利的首次工程，当时征调了上万名民工，挖掘起自微县（今澄城县）终到晋晋（今大荔县）的渠道。

据《史记·河渠书》载：“……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微（澄城）引洛水至高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颇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见其饶。”

《史记·河渠书》中记载的“龙骨”，指的是大型动物的骨化石。至于“龙首”，可能意味着人们当时挖到的是动物头骨化石。

1978年3月，陕西省水利局刘顺堂在大荔县段家乡解放村甜水沟砂砾石层中发现大荔人头骨化石。同年，西北大学地质学系、中科院古脊椎所分别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出大量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

1980年，中科院古脊椎所等进行第二次正式发掘，并在附近区域展开调查，依然发现有大量石制品与动物化石存在。

2021年11月至2022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渭南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分次对北洛河流域旧石器时期进行阶段性考古调查。一年多来，在北洛河两岸及洛惠渠流域，新发现旧石器遗址点23处，采集到石核、石片、尖状器类旧石器制品285件。采集到马、鹿、牛、蚌类等各类动物化石标本若干。发现的各类标本，均存在于河流两岸的L1（马兰黄土）、S1—S3（古土壤）和陈石层当中。

2024年8月21日至26日，渭南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对大荔县田野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时，在龙首渠引流区域、育红村、义井村等地的黄土断崖或洛河岸

断坎，再次采集到旧石器时期石制品与各类动物化石。

2025年5月15日至19日，渭南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对蒲城县文物点复查时，在井渠遗址及其周边依然发现有旧石器时期石制品与动物化石存在。并且在洛惠渠流域还新发现汉代竖井遗址2处。

北洛河两岸L1、S1—S3、砾石层中的这些石制品属于古人类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具，动物化石则是他们食用过的动物遗骸。多年来的诸多发掘成果和新发现，为研究北洛河流域气候变化、地形、地貌变迁，古人类起源、繁衍、迁徙以及动物种类演化等提供了有力的实物研究价值。

文史中记载的“龙骨”根据考古年代划分，属于旧石器文化研究范畴。这些年来在北洛河两岸和洛惠渠流域采集到的各类动物化石都可称为“龙骨”，这与《史记·河渠书》中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此也佐证了汉代人们在修建龙首渠时挖到了“龙骨”的史实。

龙首坝属于一处近代水利建筑，原名为拦河坝，是一座石拱滚水坝，它横卧于澄城县交道镇头村村西的洛河老伏瀑布上游60米处，该坝由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倡导，近代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主持规划，总工程师孙绍宗率队勘测并全面负责工程实施，工程师李奎顺设计，时任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与李仪祉共同批阅，并得到全国经委会水利处处处长茅以升、副处长郑肇经的批准。于1934年3月25日开工，次年6月20日坝体砌竣，10月全部坝工告竣。坝轴为弧形，坝面为堰奇式。坝顶长177.7米，坝顶宽5米，坝基最大宽22.5米，坝高16.2米，坝体总土方157669方，用料料20525立方米，用沙7290立方米，用水泥12092桶，支付银元217881.21元。



洛惠渠汉代井渠遗址（资料图）。

断坎，再次采集到旧石器时期石制品与各类动物化石。

2025年5月15日至19日，渭南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对蒲城县文物点复查时，在井渠遗址及其周边依然发现有旧石器时期石制品与动物化石存在。并且在洛惠渠流域还新发现汉代竖井遗址2处。

北洛河两岸L1、S1—S3、砾石层中的这些石制品属于古人类遗留下来的生活用具，动物化石则是他们食用过的动物遗骸。多年来的诸多发掘成果和新发现，为研究北洛河流域气候变化、地形、地貌变迁，古人类起源、繁衍、迁徙以及动物种类演化等提供了有力的实物研究价值。

文史中记载的“龙骨”根据考古年代划分，属于旧石器文化研究范畴。这些年来在北洛河两岸和洛惠渠流域采集到的各类动物化石都可称为“龙骨”，这与《史记·河渠书》中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此也佐证了汉代人们在修建龙首渠时挖到了“龙骨”的史实。

龙首坝属于一处近代水利建筑，原名为拦河坝，是一座石拱滚水坝，它横卧于澄城县交道镇头村村西的洛河老伏瀑布上游60米处，该坝由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倡导，近代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主持规划，总工程师孙绍宗率队勘测并全面负责工程实施，工程师李奎顺设计，时任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与李仪祉共同批阅，并得到全国经委会水利处处处长茅以升、副处长郑肇经的批准。于1934年3月25日开工，次年6月20日坝体砌竣，10月全部坝工告竣。坝轴为弧形，坝面为堰奇式。坝顶长177.7米，坝顶宽5米，坝基最大宽22.5米，坝高16.2米，坝体总土方157669方，用料料20525立方米，用沙7290立方米，用水泥12092桶，支付银元217881.21元。

大惠渠，树立起我国现代灌溉工程样板，对我国水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同志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也是千百年以来人们的智慧共识。

汉武帝时首建洛河龙首渠，灌溉蒲城县以东澄城、大荔地区。因渠道穿越商颜山（铁镰山），黄土塌方、湿陷严重，故而采取了井渠之法。

魏明帝曹叡青龙元年（233年），拓展古老灌区，在龙首渠下游兴建临晋陂引洛灌溉。充足的粮草，使这里成为曹魏政权统一中原的根据地。

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于保定二年（562年），对龙首渠曾加重修浚，使得国力大增。

唐开元七年（719年），著名水利家同州刺史姜师度在这一带重新兴建灌溉工程，不仅引洛河水，而且引黄河水灌溉，压碱淤地，水利效益更加显著。

元、明、清各个时期，皆对洛水流灌区或加固修缮，或增扩引流。

上世纪初，由杨虎城将军决策，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在龙首渠基础上主持实施了“关中八惠”之一的洛惠渠改造工程。将历代不同方式的引洛灌溉重新整合，续建扩灌。

1933年，该工程在大荔县设引洛工程处，后改为泾、洛工程局，主办洛惠渠工程。洛惠渠自1934年渠道施工以来，总干渠及渠首工程快速进展。至1936年5号隧洞遇到流沙、潜泉等困难，因此改变了施工计划。为了解决施工人员不足的问题，先后接收了由山东、河南等地前来的民工。如今，曾经为洛惠渠流血流汗的这些外乡人，已在当地安家落户，形成了大荔县义井村两个村民小组。

据悉，渠首枢纽工程在澄城县状头筑坝引水，有总干渠1条，干渠4条，支渠3条，斗、分渠648条。排水系统有干支沟8条，分毛沟210条。排灌渠道总计6277条，总长度3321公里。重点工程为5号隧洞穿通铁镰山，全长3480米。洛西桥式倒虹，全长514米。总干渠原设计引水能力为15立方米/秒，1975年扩展了总干渠，现在设计引水能力为18.5立方米/秒。有小型水库3座，库容136万立方米。水塘51座，蓄水量139万立方米。

洛惠灌区可灌溉大荔县、蒲城县、澄城县等地近80万亩农田。以洛河为界，洛西灌区27万余亩，洛东灌区50万余亩。渠井双灌的旱涝保收农田接近40万亩。

传说，正好也印证了——自古善治国者必先必治水，以求民安邦固。

2007年，彬县下决心修建河堤以根除水患，这不仅标志着彬县防洪减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更标志着彬县几十万人民群众几代人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三年过去了，2010年7月23日，彬县遭遇了一场境内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袭击，19小时内降雨量达到了219.3毫米，最高洪峰陡然增至3280立方米/秒，这是自彬县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了气象资料记载以来，境内发生的雨势最急、雨量最大、雨情最紧的一次特大暴雨。刚建成的一期防洪大堤，在特大暴雨面前岿然不动，咆哮肆虐的泾河驯服在大堤脚下……

“城在林中、院在花中、路在树中、人在景中”无论你行走在“诗经风情园”“邠风苑”，还是步入“高原明珠”侍郎湖，或延伸向镇村的公路，到处都是迷人的风景。

如今，走在泾河新区的大堤上，泾河束水而下，“泾河新区”新开垦的空地上，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新式的生活小区相继建成，中国西部义乌商贸城落户，来往的车辆川流不息，商业



大佛窟主尊阿弥陀佛造像。

陕西历史博物馆抗战展厅的光线总比其他地方沉郁几分。我站在展柜前，玻璃罩内那把日军九八式军刀静静斜卧，刃口的褐红锈斑蜿蜒如干涸的河床。讲解员张老走了过来：瞧见这缺口没有？一九四一年开春，潼关城头，一名战士用肩胛骨卡住刀刃，生用牙咬崩了这块钢。

他的声音撞开了时光的闸门。

展柜旁的电子屏正流淌着黑白影像。浑浊的黄河裹挟着冰凌奔腾咆哮，年轻士兵背着大刀列队登城。画面倏地切换，泛黄照片里，营长李振西和士兵们肩挨肩站在老槐树下，有人吊着绷带，嘴角却倔强地扬起。老人从磨旧的牛皮文件夹抽出一页复印件：赵满仓烈士子捐，背面有他父亲遭遇：若死，面朝东，护长安。

转过展区转角，半截油印滚筒躺在独立展台。杨家岭，1940年的标签晕着柔光。相邻展柜里，摊开的战地日记卷着毛边，铅笔字洇开深褐斑痕：夜半摸黑读传单，砂砾硌得掌心生疼，心口反烧起炭火。俯身细看，展台玻璃下竟散落着几星微尘，不知是历史遗存，还是今人精心埋下的伏笔。

七贤庄情报站复原场景前，游客屏息凝神。斑驳的木窗棂有道新修的裂痕，铜牌上刻着：交通员紧急传递处。耳机突然灌进风雪呼号声，一串自行车铃刺破死寂。展墙文字记载：绸布庄陈掌柜那夜消失在巷尾，次日铺面便贴了封条。指尖触到窗棂，粗糙的木纹沁着八十载前的寒气，直往骨髓缝里钻。

军刀旁的捐赠簿摊开展示。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孙铁锤的名字后跟着颤抖的墨迹，让他替年轻人记住，和平的犁铧是用什么打的坯。展柜照片里，老人脸上沟壑纵横，双目却亮如淬火之钢。出口处陈列着宝鸡机床厂捐赠的老式车床，铭牌在幽光中浮现：机体含抗战时期兵器熔铸件。

闭馆音乐《黄河谣》响起时，我再度折返。灯光渐次熄灭，刀身锈迹在昏暗中蔓延成河。几个红领巾追逐跑过，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突然驻足：爷爷，血簿里开花了！她踮起脚，将粉红温热的手心贴上冰凉的玻璃。我的手指也随之落下，金属寒意渗入皮肤，心底却有热流轰然奔涌，那温度沿着血脉逆流而上，撞开一九四一年的潼关风雪，融化了延河畔的寒冰，最后停在七贤庄那盏将熄未熄的油灯上。

步出青铜大门，晚风拂过面颊。护城河倒映的万家灯火，恍若当年地下党在密室窗缝中仰望的星河。回望博物馆巍峨的轮廓在暮色中渐隐，骤然彻悟：那些封存在玻璃后的热血从未冷却。它们化作三秦大地的温度，在潼关古槐的年轮里流转，在油印滚筒的裂痕中蛰伏，在每次触摸历史时苏醒。

城墙根下，卖剪纸的老艺人将红纸翻飞。锐利的剪刀游走处，延河宝塔、潼关雄姿、七贤青砖次第绽放。最后展开的，是棵枝繁叶茂的国槐，浓荫如盖，细碎的花瓣如星点般缀满枝头。老人将剪纸递给我：“这老树，年年暑天都撑起一片清凉，你看这新发的枝叶，密密匝匝，片片都迎着光长。”

暮色四合，掌心的剪纸微微发烫。博物馆的轮廊在身后沉入夜色，我仍知道，明日朝阳升起时，玻璃柜中的铁血与星火，我仍将在光阴里静静燃烧，它们早已熔铸进民族的骨血，化作支撑我们昂首前行的那道永不弯曲的脊梁。

往 事